

# 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

(增订版)

中华书局

# 增订版自序

虽然我从小就喜好历史，但那只是少年时代盲目好奇心的表现。直到1978年10月考取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三年后又留校工作，才确定了以历史地理研究为终身职业。刚读研究生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为何物，就像外界不少人以为就是历史加地理这两门学科。幸而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抱病设帐，在华东医院大厅一角为我们五位同学讲了第一课，才明白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学、地理学的关系，不禁心中窃喜，原来歪打正着，所选专业正适合自己的需要，符合自己的兴趣，也能利用自己尽管不多却也不无价值的积累。更出乎意料的是，一年后领导明确我担任先师的助手，从此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先师的耳提面命，瞻仰史学界泰斗和前辈的风采，聆听他们的教诲。

一开始我选定的研究方向是西汉人口，1979年写了一篇《西汉人口考》，发表于《中国史研究》，以后用作硕士学位论文。1983年以此为基础写成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又承担《中国人口》项目的子课题，完成中国人口历史变迁的概述，直到完成《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不过我最关注的还是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内的发展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幼时读《三国演义》，对“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印象深刻。以后自学历史，了解了历朝历代的兴衰，似乎证实了这种分合的规律。而历史学界长期肯定的规律却是，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是支流；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分裂的时期越来越短；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过，联系到具体问题后，就发现没有那么简

单。特别是在协助先师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对历史时期疆域的变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纠正了长期沿袭的误解。例如，以往无不将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当作大分裂后重新统一的开始，而实际上，且不说北宋的统一始终没有完成，而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辽、宋对峙，西夏、大理、吐蕃并存，如果将北宋看成统一，实际是将其他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我将心中的困惑汇报于先师，他也颇有同感，但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的他，对《地图集》中的某些不实之处却无能为力。由于我随侍先师的时间很多，有时连续几个月住在外面，主要就是修订《地图集》、整理《肇域志》、编审《历史大辞典》条目等，统一与分裂往往成为我们饭后、睡前的话题。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和深入，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也开始打破以往的禁区，特别是在口头讨论中，已经相当尖锐地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涉及不少敏感领域。1986年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北京大学的田余庆教授在费正清中心作讲座，在自由讨论时，他也就统一分裂问题发表了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87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策划一套面向大众的中国政治丛书，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将多年来的思考从“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的角度写出来。到1988年暑假，这本小册子已经写得差不多了。8月间去东北考察，从黑龙江黑河顺黑龙江而下。航行在这条曾经是中国的内河、而今却已是中国和前苏联界河的江中，迎面驶过的前苏联客轮上人们热情的招手，江边却依然可见一座座岗楼、灯塔、兵营，我在船舱中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段。

开学不久，学校发出通知，征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我将书稿的主要观点写成《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一文应征。我的论文入选教育部的理论讨论会，我去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组成评委评选出席全国理论讨论会的论文，我的论文再次被选中。历史学科评出两篇论文，另一篇是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的《论多元一线》。

当年12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北京大兴召开。上海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八人：复旦大学蒋学模（经济）、顾国祥（管理）、叶易（文学）和我，上海社科院俞新天、李君如和陈锋，还有一位宝山钢铁公司的代表。带队的是新任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副部长刘吉是大会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同去的还有理论处处长吴修艺。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开幕、闭幕式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会。会议结束时，不仅给每篇论文的作者颁发了盖有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大印的奖状，还发奖金一千元，优秀论文（如罗荣渠的论文）发了二千元，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大奖。据说有的省市在会后又发了配套奖金。

改革开放是会议的主题，但争论非常激烈，如对会议的文件之一——中央一份正在起草中的文件，有的认为不应再提“自由化”，有的则以为反自由化不力，还有各种意见，双方或多方剑拔弩张，有时火药味很浓。但讨论集中于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方面，历史方面的论文仅有来自高校的这两篇，社科院、党校系统没有选出历史方面的论文。

1989年初，上海市历史学会召开年会，会后出版论文集，我将会上的发言整理成《再论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一文发表，对前文作了补充。

等到那本题为《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时，在短期内印了两次，一万多册很快供不应求。还在1989年初，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将书稿中的一节整理为《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代名词》一文投给《光明日报》，于当年8月发表。

《普天之下》受到外界的重视。韩国某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日本的刊物摘译了大部分内容，美国的学者发表了意见，台湾版本也在不久问世。第二年，三联书店与台湾锦绣出版有联合出版一百种“锦绣中华”丛书的计划，向我约稿。我也觉得《普天之下》言犹未尽，再说因种种原因，出版社已不会重印，于是我以此书为基础，扩充为《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书稿完成后，我曾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满意的书名，但与《普天之下》比都相形见绌，不得已，只能用了这个相当直白的名字。

1992年后，我就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写了一些供知识界的同人阅读

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书屋》等刊物。这些文章的着眼点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但基本的观点都是围绕着统一与分裂这一主题，可以说是提供了若干实例，或者是作了具体的注释。近年来因种种原因，写得少了，但只要有可能，我还是打算写下去。有的题目，如霍光，腹稿已打了好久，并曾答应交给当时在编《万象》的陆灏兄，希望能快些问世。

1998年底，当时供职于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刘景琳兄约我写一篇比较全面反映我某方面学术观点的文章，字数可达三万，编辑保证不改。这吸引我写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发表于该社出版的《学说中国》一书。

三联版的《统一与分裂》印了三次，此后未再出版。但好事者或好意的人早已将此书的全文或章节放在不同的网站，我还见过全文收录这本书的盗版光盘。不过还是不时有人向我索书，其中有的读者尽管已经在网站下载了全文，却还希望有印刷出版的书本。我与三联的出版合同早已期满，而中华书局有意出版，所以就有了本书的增订版。

考虑到这是对我在这方面研究的一次小结，我汇集了从《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开始的几篇论文放在附录中，和《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一起出版。因为这些文章写在不同的时间，又分别发表，所以难免有重复的地方，但为了保持原貌，增订版中一律按原文，不作任何删改。

写完这篇自序时，我已过了六十周岁。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从《普天之下》发表至今也已有十七年。其实我的很多看法，我的老师、前辈早已形成。我能够发表这些文字，并且得以延续近二十年，衣食无忧，又不受干预，既说明探索的艰辛，也是一种幸运。如有可能，我愿再探索二十年，愿与同行和读者共勉。

葛剑雄

2007年于复旦大学

# 引言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埃及人在公元前 4000 年前后就有了历法，这时中国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苏美尔人在公元前 3500 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此时有了最初的图形文字，并在公元前 3200 年左右开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在公元前 3200 年形成了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 3000 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 2870 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 2780—2680 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 2550 年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五千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 1680 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 3000 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传说是否确实，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6 世纪。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

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 18 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原苏联的领土是 2240 万平方公里，为中国领土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现实的数字完全不同了。10 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扩大了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 12 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1223 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14 世纪以后，相当于中国元末明初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大起来，吞并了所有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16 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1667 年，吞并东乌克兰和基辅的事实得到了波兰的承认。1775 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1783 年夺取克里米亚。17 世纪俄国扩张到亚洲，18 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19 世纪从中国攫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原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惟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回顾历史，中国还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于世界的纪录：

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 722—前 481 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全国性的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 17 世纪—前 11 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修订，但一直使用了几千年，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自汉武

帝开始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纪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1911年）。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却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作用范围越来越广。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这是一项多少人曾经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之讴歌、为之自豪的伟大事业，也是现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观察一下历史，还可以发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这样的统一并不限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应该包容整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在统一范围之外的不是文明社会。这种观念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长达二千余年，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些人的追忆，令一些人陶醉。

但是这样的统一观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一步对我们这项遗产的价值提出了疑问。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包袱，认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都是，还是都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对历史进行回顾——站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今天的影响。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中国是昔日的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

不能不接受。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 21 世纪的世界  
上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  
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

# 昔日的天下观

---

当地圆学说在晚清传播时，輿情大哗。不少饱学宿儒发出共同的责难：“要是地球真是圆的，生活在另一面的人难道都是倒立的吗？”

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是到 19 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但中国统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君主真正能够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西周时就已经普遍流传，并且被视为真理而接受。

不过，这首颂歌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个）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

## 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同。

##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

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人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划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人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禹贡》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还只能证实商朝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遗址，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属于夏朝。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遍的承认，那么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地理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

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政治理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 2 世纪末，也就是在《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前 106 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附近的七个郡级单位以外政区分属于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地方官和豪强地主，称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而是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 1 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从这一角度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在《禹贡》中还记载了一种“五服”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根据这样一种国家模式，在王所居住的京城之外的土地应该分为五等，每一等四方各五百里。从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

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地区）。

如果说，九州制因为是以名山大川为主要界限，所以还能使人相信为实际行政区域的话，五服制这样四四方方二千五百里的划分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连宋代的儒家学者蔡沈在给《尚书》作注释时也不得不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南部，恐怕不会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这么远，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了。而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反而被列入要服和荒服（离冀州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里），根据地势来考察，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五服制中有一点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力低下、运输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王（天子）对臣民的贡品的征收不得不随距离的远近而改变。例如在天子直属区“五百里甸服”的范围内就规定了五种不同的纳贡标准：一百里内割下来的作物连穗带秆一起交，二百里内只交谷穗，三百里内交谷子，四百里内交粗米，五百里内交精米。实际实行的制度虽不可能如此刻板，但运输能力显然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九州制是对未来的设想，五服制却是对过去的理想化。因为在西周和以前虽然采用过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却并没有把每一等级固定为五百里，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所以五服制虽见于《禹贡》，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实行过，只能胎死腹中。

## 大九州说

正因为九州制仅仅是一种理想，所以在《禹贡》问世以后，还出现了另外几种九州方案，如《周礼》（也是托名周朝制度的著作）中的《职方》、《尔雅》中的《释地》和《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都提出了自己的九州规划，各州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的范围也有所差异。

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又提出了他的大九州学说，大意是这样的（今译）：

儒家所谓的中国，不过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的名称叫赤县神州，内部有九个州，就是大禹划定的，但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州。在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单位共有九个，这才是九州。在九州的周围有大海包围，人类和动物都无法来往。这样的九州合起来又是一个州，像这样的单位也有九个，在它们的周围有更大的海洋包围着，这就到了天地的边缘了。<sup>②</sup>

这种学说与其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种中国就等于天下，除了中国（实际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社会的观点来，大九州学说高明地承认还存在着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又作了实际上的自我否定：由于各州之间都由无边无际的大海阻隔，人民禽兽是无法来往的。所以这种存在只具有理论和思辨上的意义，而不是对中国有影响的现实。

## 中原和华夏

无论是九州的设想，还是大九州学说，出现在战国后期都不是偶然的。

《禹贡》所描述的地理范围已经相当广大，涉及今天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要具备这样丰富的地理知识，活动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是办不到的。而在战国后期，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个主要诸侯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范围，在互相的交流中，各国的学者就可能掌握这些地理知识。《禹贡》中还记录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如土壤的类型、土地的等级、水文状况等，应纳贡赋的等级和物产等，都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准的反映。例如梁州的贡物中有铁和镠，镠就是钢。如果没有冶金技术的进步，学者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把这种品种载入著作。

在七国的竞争中，尽管鹿死谁手还没有最终明朗，但统一已是大势所

趋。秦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向秦国，并为秦国战胜其他六国，完成统一事业出谋划策，也为统一后的未来规划蓝图。多数研究者认为《禹贡》是秦国学者的作品，就考虑到这个因素。

在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海洋上，还不存在在总体上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和政权，而对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不至于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但肯定相当有限。

然而随着境外的玉石、珠宝、香料等珍奇异物的流入和亲历者见闻的传播，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动摇。根据九州的理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但这些珍异并不产在九州，而是来自“非我族类”的夷狄之邦；莫非那里存在着比中原更高的文明？国君、贵族和上层人士享用着来自境外的珍奇，却从不承认会有文明程度超过自己的社会，于是西方的昆仑山、西王母、瑶池和东方的海上神山一类神话便合适地弥补了这一漏洞——原来在中国之外的确存在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灵世界。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中心地位，因为西王母尽管伟大，昆仑山尽管崇高，蓬莱岛尽管奇妙，却都属于神仙的体系，而除了神仙之外，境外就只是一片愚昧落后的混沌世界。

可以认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

## 一厢情愿的“天下”

经过秦朝的短期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

固下来了。到公元初，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设置了一百零三个郡、国（一级政区）和一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二级政区），直接统治着六千万人口。这一范围比《禹贡》九州要大得多。

## 九州观念的延续

汉人的足迹，根据明确的记载，已经达到了中亚、西亚，直到地中海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大一统的蓝图早已成为现实，而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不像珠玉玩好那样只是皇家的珍秘，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按照汉朝的兵役制度推测，绝大多数郡国都有人参加征伐匈奴、大宛的战争和在边境的屯戍，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人亲身经历“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和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还是比较翔实可靠的。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原来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汉族）为主干的统一观，反而还有所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